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ZOSHIJI WAIGUO WENHUA MINGREN SHUKU



池田大作集

CHITIANDAZUO JI

文化交流不外是把
人与人的心联系在一起，
在其琴弦上奏出共鸣的和声。

上海遠東出版社



池田大作集

CHITIANDAZUO JI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池田大作集

编 选/何劲松

责任编辑/金 水

装帧设计/范峤青

版式设计/李如琬

责任制作/晏恒全

责任校对/周国信

出 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05 千字

印 张/11.5

插 页/4

印 数/1—3100

图字:09-1998-114

ISBN 7-80661-655-1

C·9 定价 19.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池田大作集/何劲松编选.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ISBN 7-80661-655-1

I.池... II.日... III.池田大作(1928~)—选集
IV.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018 号

本书中文版由日本创价学会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
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慄觳觫。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個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蟋蟀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国外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1997年8月12日,北京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主编开卷语

林贤治

时间的发现与分割,无疑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智慧之一。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必然穿透个人而接连更多同类,抵达辽阔的界域,承载且激荡着丰富的内容。世纪令人怀想全人类。时间与空间有一种庄严的对称。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 20 世纪的入海口。

远溯世纪的源头,便见绝壁重渊,狂流乱注。两次世界大战,漫过短暂的空隙地,蜿蜒至半个世纪;虽然最终为人类意志所遏止,留下的废墟毕竟是巨大的。奥斯威辛至今不长青草。19 世纪,共产主义幽灵犹在西欧徘徊,这时屹立东方,热烈而坚定,恰如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为十月革命犁耕的土地,崛起苏维埃政权,继而又红了欧亚一大片,甚至点染了美洲一角。30 年代经济大危机过后,几十年间,不复发生如此惊险的故事。“看不见的手”在加紧运作。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仿佛已经穿越有关垂死的预言,平稳进入卡恩所称的“大过渡”。及至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遽然发生戏剧性演变,致使那些历史的过客在柏林墙的坍塌声中纷纷谢幕。所有这一切,其实仍然不能称作“意识形态的终结”。社会主义以其固有的力量,使东方一个传统深厚的民族,在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保持独特的面貌。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的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 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 至 60 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 至 70 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 至 90 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时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 20 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有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1996年7月,广州

池田大作及其“人学思想”(序一)

何劲松

一、池田大作与创价学会

池田大作先生现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会长。他被公认为世界著名的宗教、政治活动家,和平运动推动者,“平民大使”。他领导的创价学会是日本当代最大的宗教组织,现有会员 803 万户。他所指导的国际创价学会在 115 个国家拥有 126 万名海外会员。创价学会创立于 1930 年,时称“创价教育学会”。二战期间,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而遭到镇压,第一任会长牧口常三郎死于狱中。战后,由户田城圣重建,改称“创价学会”。1960 年池田大作以 32 岁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年龄就任第三任会长,在六七十年代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不足 20 年时间里,使创价学会的会员增长了 10 多倍,从而跃居日本各宗派之首。1964 年,池田大作为了扭转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一味地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不合理的政治状况,创立了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公明党,在日本政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池田先生出生于 1928 年,全家以紫菜业为生,十分贫寒。和昭和初年出生的许多人一样,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军靴声中度过的,4 个哥哥被送上战场,大哥喜一战死,因而他特别憎恶战争,热爱和平。战后的一个时期里,他甚至将是否反对战

争而入过狱当作判断此人是否可信的主要标准。担任会长期间,他还创办了创价大学、创价学园、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东京富士美术馆、东洋哲学研究所等学术文化机构,将国际和平与文化交流活动当作学会的主旋律。他还十分关心人类的未来,频频地同各界有识之士进行对话,内容涉及世界和平、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传统与对比、宗教与科学、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及人口、环境等各种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池田先生一直注重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他便多次呼吁日本朝野:“今天的日本应当站在世界的视野上,为了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倾全力于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中国加入联合国、促进日中贸易等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上。”^① 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廖承志等曾高度赞扬池田先生对日中友好所作的贡献,并指出创价学会一直是日本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力量。

回顾池田大作先生的和平、文化足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行动背后的深刻内涵和基础,这便是他一以贯之的“人学思想”。今天,在创价学会迈入 65 周年之际,在整个世界朝着和平方向前进,同时局部地区仍然频繁出现战争的时候,重温池田先生富有入道精神的“人学思想”,或许更能显示它的历史意义。

池田先生的“人学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宇宙与生命的起源、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关于人性、人的革命等几个方面。^②

二、宇宙与生命的起源

对宇宙的探究,不仅是天文学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古往今来哲学和宗教无法回避的问题。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人就有了自己的宇宙观,古希腊人也曾尽力描述过宇宙的形象。纵观

① [日]《池田会长全集》第 4 卷,圣教新闻社,1971 年。

② 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池田大作和汤因比的对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年版),文中只注明页码。

世界上影响较广的几大宗教也都用庞大的理论体系勾划出各自不同的宇宙模式。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之后,关于宇宙的研究进入正轨。20世纪,天文学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素粒子论等基础上,又将视野从太阳系拓宽到银河系。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新的难题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很难进行实验,以至池田大作和汤因比等认为,虽然人们比前人增加了一些关于宇宙的知识,然而对于宇宙的本质问题仍然停留在古人的理解水平上,一点也没有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使人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宇宙的本质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靠哲学和宗教加以解决的”。

关于宇宙的探求,归纳起来大约为两个方面,一是宇宙的大小问题,另一个是宇宙的起源问题。在此,池田先生注意到了所谓的膨胀宇宙说及其主要流派之一的盖莫夫的爆炸说。按照盖莫夫等人的理论,宇宙大约在200亿年以前,从巨大的原始状态开始膨胀。此说推想宇宙之上是一片虚无的世界在扩延,而膨胀的宇宙不管有多大,也是有限的。关于宇宙的历史,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也认为宇宙开始于200亿年之前。与时空有限的膨胀宇宙说相应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把宇宙的范围再想象得大一些,则有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巨大的宇宙(它很可能是复数的)。池田先生推断,如果此说真实,则我们观察到的所谓大宇宙实际上只不过是真的大宇宙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大宇宙无限广阔,其自身是永远不变的。

对于宇宙的探讨直接关系到生命的起源问题。以地球为例,现代科学思想认为,生命是在地球的进化过程中自然地发生的,具体的过程是先从无机物中产生了有机物,接着形成蛋白质,进而产生了生命体。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是人们发现的原始阶段的生物化石和人工合成的简单的有机物。池田先生认为,上述理论是从物质方面对生命的发生所作的解释。但是,他感兴趣的不是生命“怎样”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诞生,而是“为什么”诞生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应当去探究生命的本质。

谈起地球的生命,池田先生说,在其形成的早期大概是没有生命的。但他同时指出:“所以出现了生命,是因为无生命的地球内部,就已经存在向生命发展的方向性。”生命本身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它的能动性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激发性”。表面看似无生的地球,其内部已蕴含着有生。而这种具有能动性的生的自我显现过程,就是生命起源的意义所在。

推而广之,大宇宙本身也是一个生命体。“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生命世界的天体,也可以认为其中蕴育着生命发展的方向性。因此,一旦条件具备,顺应其条件的变化,就会出现各种生物学上的生命。”佛法的“生命论”告诉人们,宇宙本身便已具有生育生物的力量,而生命则以冥伏的状态存在于无生的物质之中。

传统的观点对生命的起源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认为生命是“创造”(creation)而成的,而所谓创造就是迫使以前阶段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存在。另一种解释认为生命的产生来自“发现”(evolution),发现即把原来包含着的东西展现出来。在这两种解释中,池田先生更倾向于“发现”说,因为使地球上的生命自诞生以来一直向个别化方向发展的能动性(亦即“生命能”的力量)实际上早已存在于无生命的地球本身之中。所以说“生命其自身既是作者,又是作品”。

持生命创造说的人也许会提出人工合成生命的成功例子作为反证,但池田先生回答说:“我认为生命的合成并不是创造生命,而是创造了为发现生命所需要的人工条件。我们只能说,生命是不能创造的。人们所能作的,最多是从物质内部把本来就存在的生命引导出来而已。”接着,池田先生还运用佛法中“空”的概念以说明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来研究宇宙的局限性。有、无这两个绝对的概念只能将生命的发生解释为“无中生有”。但是,佛法中“空”的概念超越了有和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潜藏着产生有的可能性的一种叫作‘空’的无的状态,即把‘空’理解为内含于宇宙中的实际存在”。这样的“空”不是以空间和时间为准所能理解的。就是说,包括我们所处的地球在内,大

宇宙本身就已包含着处于“空”的状态的生命。只要具备了作为“有”的必要条件,宇宙的任何地方都有可以产生生命体的可能性。正是从宇宙内含使生命得以诞生的力量这种意义上,池田先生将之称作“生命之海”。

谈到了生命的起源,当然还需回答生命是否永存这一问题,唯物论认为,人死了,肉体还原为无机物,生命本身同时消失。唯心论正相反,认为生命是不灭的。就佛教、印度教、袄教以及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来讲,基本上都主张肉体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当然,关于死后人生存在的形式,以上几种宗教的观点又各不相同。如佛教、印度教等主张“轮回”说,而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宗教则主张“灵魂不灭”说。

池田先生也认为,所有的人类生命一方面是个体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即在生命的深处又和宇宙生命合而为一。他推断,现实中的肉体尽管因为死亡而还原为无机物,但精神的存在中所包含的那种肉体的倾向性却并不随之消亡,而是继续存在。有朝一日机缘成熟,肉体大概又以看得见的形态继续存在。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死亡,肉体和精神相分离的想法,事实上必须认为这恐怕是智能所犯的一个错误。”

对于生命存在的方式,池田先生赞同生命超越时空的范畴这一观点。因为他认为时空是人创造的概念,是人的生命在其活动中设立的框子。换句话说,没有生命的活动,也就不可能有时间的空间。佛法里,人们死后生命存在的方式被概括为“空”这一概念,照池田先生的理解,“空”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存在状态。当它不作为现象出现时,即不为眼睛所能看到时,也可以说就是“无”。但是遇到机缘时,这一存在又要作为肉眼能够看得见的现象而出现。从这种意义上讲又不等同于“无”。因此,这种状态不是“有”和“无”这两个概念所能完全表达得了的。

大乘佛教在解释生命时,用“生”和“死”这两个概念来代替“有”和“无”,并提出了所谓的“生死不二”的命题。什么是“不二”呢?“不二”就是说“生和死这一时间和空间范畴的现象,是生命这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显现方式”。每